

【抗日战争研究】

情感动员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斗争

史泽源

【摘要】情感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在依靠行政手段长期无法有效贯彻减租政策的情况下,于1943年底开始彻底改用发动群众的减租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各根据地为了提高农民自觉的减租意识,打消其对地主的畏惧心理,高度重视群众情感动员。经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引导下的情感酝酿、升温与宣泄,农民由零散的个体逐渐集聚成团结的群体,并以集体的力量赢得了减租斗争的胜利。同时,农民还在这一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关键词】情感动员;减租斗争;华北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

【作者简介】史泽源,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

【原文出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京),2023.1.75~8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党的宣传工作机制建设及历史经验研究(1949-1957)”(22CDJ014)。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实施的重大方针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点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部分学者基于翔实的史料指出:华北根据地在落实减租减息政策的过程中遭遇了强大阻力,并导致减租政策仅在抗战后期得到贯彻,减息政策更是由于“借贷困难”,被迫实行了妥协、调和的执行方法^①。这些研究成果呈现了党在华北根据地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的艰难历程,但仍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部分学者已经发现,抗战后期减租政策的广泛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党改变了推行这项政策的方式,特别是转变了具体斗争策略^②。然而已有研究囿于“理”的解读,疏于“情”的观照,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减租斗争的复杂性与解释力。本文认为,减租政策在华北根据地的执行程度,同党的情感动员^③成效直接相关。需要强调的是,情感动员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党的组织、宣传等政治能力,也同工作环境密切相关。本文立足全面抗战时期党领导的华北根据地

的减租斗争,剖析党情感动员的运作机制,以及根据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的认同过程。

一、1944年前的华北减租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巩固统一战线,就如何贯彻减租政策持高度谨慎态度。1938年初,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明确指出:“应该切实避免采用斗争的手段,应该采用协商调节及仲裁等方式为主,去达到群众要求的被承认,去达到工农群众与地主资本家双方的同意与妥协。”^④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解释减租政策时,更直接称其是一个“消极办法”,并强调,“在执行这一办法的时候,应该采取多种的方式使得被减的地主财主得到满意,使得租户、借户了解减租减息只是改善其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而对地主财主和好,以更加巩固起统一战线来”^⑤。之所以在部署减租工作时如此强调地主的感受与利益,有其因由。一方面,1935年底,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不久便领导实施了东征战役,这虽扩大了党在华北的影响,但却并未实现在黄河以东建立根据地的目标,故对于

刚刚开辟的华北敌后根据地,党必然是倍加珍惜;另一方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实行过激土地政策导致新建根据地迅速夭折的教训,也会使党更加小心处理同地主的关系。

当然这一时期,党强调照顾地主的感受与利益,绝不是放弃执行减租政策,置农民于不顾,而是希望通过减租工作,既能团结地主,创造有利的敌后发展环境,又能减轻农民负担,发动群众抗日。党所要极力避免的是,在根据地尚不巩固、八路军实力又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以剧烈阶级斗争的形式推行减租政策。如此看来,在全面抗战初期,依托政策制定、干部层层推进等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显然是落实减租政策的更好选择。然而事实证明,经由上述方法,除了各根据地的小部分中心区域外,绝大多数地区均无法落实这一政策。导致行政手段受阻的原因是复杂多重的。首先,地主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轻易将被褫夺的利益转嫁给佃户。华北根据地初创时,主要实行“二五减租”,即“地主之土地收入,不论租佃半种,一律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4],地主却对涉及切身利益的“法令条文细密研究,找空隙进攻”^[5]，“当我们还没有提出减租政策的时候,便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在每一个佃户的原租额上都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6]。然而,曲解政策仅是地主依靠经济优势欺压农民的常规手段,通过“夺地”使农民彻底丧失经济来源才是地主对抗减租政策的杀招。农民由于坚持减租而被地主收回土地,最后被迫逃亡他乡乃至家破人亡的例子并不少见。

事实上,各根据地对地主可能凭借经济优势逃避减租的情况并非全不知情。各地制定的减租条例,多明文规定地主不得在未经佃户允许的条件下,随意转租土地,并制定了处罚违规地主的细则。然而由于当时华北根据地尚未实行深入的政治改革^[7],相当一部分基层政权仍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这使得地主更加肆无忌惮地违背减租

法令。

除了经济、政治层面,地主还对农民实行牢固的思想统治。即便到了1948年,刚解放的华北农村仍给美国记者韩丁留下了如下印象:“地主的统治是靠几根支柱撑持着的,其中重要的一根就是传统。数千年来的儒家学说造成了一种舆论,使全村很少有人、甚至根本无人对现存的制度提出疑问。”^[8]这种思想统治,除了具有稳定性特点外,还有很强的隐蔽性,也使党很难通过出台政策等行政手段,破除减租的思想阻力。一线干部也在实践中体会到,同政治改革相比,解放思想的难度要更大^[9]。

倘若把减租政策比作一个农民、地主各置一边的天平,它的本意是让农民与地主在经济上保持一定的平衡,即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地主又保有一部分收益。但在全面抗战初期,地主阶级在多方面占据优势,天平明显偏向于地主一侧。这种现实情形也使各根据地认识到,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难以贯彻减租政策^[10]。中共中央释放转变减租实施手段的强烈信号,是在1942年初。这年1月28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率先指出,“须知发布口号发布法令与实行口号实行法令之间,是常常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的”^[11]。一周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更是强调:“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12]

党之所以在落实减租政策上由倡导避免斗争转向支持斗争,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从大背景看,相比于全面抗战初期,党的武装力量大为增强,在华北建立了相对巩固的根据地。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曙光浮现的形势下,党希望通过落实土地政策,“藉此争夺民众以图未

来”^[13]。二是经过多年实践,党对如何开展减租工作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首要一条便是非经过“斗争”不可。刘少奇是当时党内提出以发动群众的方式推行减租政策的主要代表之一。1940年华中根据地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较为深入的减租运动。1942年,刘少奇从华中赶赴延安,途经山东、晋西北等根据地时,多次讲述华中地区开展减租运动的基本经验。其核心思想就是减租必须依靠发动群众的形式,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农民起来了,就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14]。这一指示对华北根据地开展减租运动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从此,一个大规模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在太行根据地腹心区开展起来。”^[15]

1942年华北根据地在领导布置减租工作的过程中,多注意到了从情感上动员农民的问题。1942年4月,晋冀豫根据地强调:“在任何一个斗争阶段上,都要具体了解情况,了解各地地主阶级的复杂态度与农民各种落后顾虑及其心情的变化。”^[16]山东分局则提醒各级干部注意:“不要在农民斗争的情绪上浇冷水,助长地主的气焰。”“要抓紧一部开明的地主士绅,从感情上团结他们。”^[17]从效果上看,这段时间的减租运动同此前相比虽有所进步,部分地区还一度出现运动热潮,但也存在明显不足。特别是尽管中共中央及各根据地反复强调,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做思想工作来提高群众自觉的减租意识,但在实际工作中,各地仍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发动群众,整个运动没有在群众间经过充分的思想酝酿。“从干部思想作风上说,1942年群众运动中,代替包办、恩赐作风是严重存在的,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发动了群众。”^[18]除了干部主观上轻视外,提高群众自觉的减租意识、保住减租成果还需要相对安定的环境作保障,而当时华北根据地尚不具备这一条件。1942年前后,日军向华北根据地连续实施大规模“扫荡”,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各根据地均深陷困境。不仅辖域面积变小、军队减员,甚至还

出现了大面积饿死人、病死人的惨象。在此情势下,党只能将工作重心转向生产救灾。地主则乘机拿“变天”威胁群众,夺回减租成果。此外,在运动中华北根据地放松了政治方面的改革,“对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打击不力,不少村庄仍有地主在暗中统治”^[19]。这也是导致减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晋察冀、山东等华北根据地的发展状况出现明显好转。这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这一指示一方面指出“统一领导”“整顿三风”“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则突出强调了发动群众减租的必要性,即“凡不发动群众自动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20]。自此,华北根据地又陆续掀起了新一轮减租热潮。

二、组织引导下的群众情感酝酿

全面抗战以来近5年的华北减租实践已经充分说明,减租政策的有效执行不会是一个自发过程。实际上,党组织、基层政权也一直参与领导,特别是自1942年初,中共中央提出改用发动群众的方式推行减租政策后,各地颁布的减租法令或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启发群众减租自觉性的问题。然而从实践看,农民多将减租成果看成干部的“恩赐”,待党转移工作重心,地主又轻易地从农民手中夺回失去的利益。而之所以造成这种减租困局,除了地主的强势阻挠以外,还包括干部忽视群众工作的原因。“在1942年群众运动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违反群众路线的作风,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包办的‘恩赐’的作风,控制群众的作风。”^[21]然而不到两年时间,当中共中央于1943年底,再次将减租作为各根据地的主要任务之一时,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却得到了多数党员干部的自觉响应。这同当时正在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不无联系。1944年晋绥边区总结减租运动时指出:“经过

两年来的整风教育,绝大部分干部在思想上克服了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建立了群众观念与劳动观念,因此,对减租政策有了正确的认识。”^[221]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离不开对群众情感的理解与把握。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多次谈到从情感上发动群众的问题。其中最经典的要属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关于自身情感转变历程的真情流露^[221]。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关注群众情感的强调,直接影响了华北地区的整风工作,“对每一个参加整风的干部,一方面要有严格的思想斗争,一方面要有热诚的感动。斗争和感动都是群众性的”^[24]。这也使得华北干部在1944年前后的减租运动中,更加注意群众情感。1943年晋西北根据地在布置减租工作时指出:“中心问题在于如何具体深入地了解情况,了解佃户生活及租佃间的剥削关系。用活生生的事实针对佃户的心理活动及存在的糊涂观念,对他们进行深刻的教育,解除封建思想对农民的统治,提高农民的觉悟和斗争的信心。”^[25]启发群众减租自觉性,也被称作酝酿或反省阶段,并被各根据地普遍作为开展减租运动的首个环节。

在实际工作中,干部很快认识到情感引导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他们经调查发现,群众的减租意愿非但不强烈,甚至完全没有。在阶级压迫严重的山东根据地莒南县大店地区,干部询问群众:为什么农民天天干活,还是受穷?“他想了半天回答:‘这些年短工太贵了。’(他是大佃户,收割时雇短工)又问他其他原因,回答:‘我种的地总是舍苗,少打粮食。’再追问时,他顺口气说:‘咱命苦啊,那有什么办法。’”^[26]这其中虽也存在农民因畏惧地主而故意遮掩受剥削的情况,但宿命论的想法在乡间确实较为普遍,并被干部视为发动群众的主要障碍^[27]。

对于主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自然容易想到改变群众对于减租的消极心态特别是打破宿命论,有必要对农民进行阶

级教育,以启发其阶级觉悟。“使农民懂得剥削,懂得农民和地主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也就是使农民阶级自觉起来。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内容。”^[28]但想在短时间内,使文盲占多数的农民大众,掌握和理解阶级理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有必要将阶级理论转化为一种容易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形式,这也正是情感动员在减租斗争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事实上,群众对于地主的过度剥削是存在不满情绪的,但由于担心地主以夺地、甚至是人身攻击等方式进行打击报复,他们不得不压制愤恨之情。晋察冀边区将佃户的心理归结为“三怕”,“即‘怕夺佃,怕丧良心,怕八路军走’。他们宁肯忍饥挨饿,拖着棍子讨饭,宁肯折卖自己的家产,卖核桃、花椒去交租,也不敢向地主提出减租的要求”^[29]。而酝酿阶段的核心目标就是使农民敢于公开表达对地主的不满情绪。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配合宣传鼓动,被频繁运用于1944年的华北减租运动中。但干部也在实践中发现,仅凭调查与鼓动,很难做到了解全部实际情况。甚至个别性格急躁、作风有待改善的干部,很快失去了动员耐心,“群众情绪越低,我们的同志就越怨群众‘成问题’、‘落后’,鼓动就更加加油起来”^[30]。这使得减租运动陷入了僵局。为打开局面,党及时调整了工作策略,即由全面调查改为个别发动。干部在工作中发现,尽管绝大多数群众在思想动员后,仍对减租持冷漠态度,但也有个别农民积极响应减租政策,他们被称为减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主要由党的干部在调查鼓动及实际斗争中发现,也有少部分是被群众推举当选的。由于这部分人同农民联系密切,农民对他们的防备心理相对较少,更乐于向其吐露心声,这使得党高度重视积极分子在减租运动中的作用。“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地讲,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即是掌握群众思想与掌握积极分子,这两件东西是基本的。”^[31]为了使积极分子在情感酝酿中发挥更大作用,党不仅通过举办训

练班,向其讲授减租政策,传授动员方法,还非常注意提高积极分子的威望与地位^[32]。

随后各地干部在积极分子的协助下,召开了有十几或数十农民参加的酝酿会。“这种群众的酝酿,开始主要是交谈,干部与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与群众,群众与群众,‘商量商量’、‘喊喳喳’、‘闲谈’、‘拉背场’,然后才是我们所习惯的小组会与群众大会。”^[33]酝酿会一般先从诉苦反省开始,其目的是“引导农民认识自己在阶级社会里怎样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他认识穷不是命,穷也不是天定的,而是地主阶级剥削穷了,启发阶级觉悟,启发斗争勇气,敢于向地主斗争”^[34]。但仅有诉苦反省还不够,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并找到导致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要通过“算翻身账”实现。“这种算账,一般地是算租佃账(地主对农民租额剥削账),算农民家庭账(农民过去怎样受剥削,现在怎样)、地主家账(地主怎样富起来的)、全村大账(几个地主对全村的统治、压迫、剥削)。”^[35]最终使群众认清阶级界限,认识到受穷是由于地主剥削造成的,且团结起来与地主斗争。

酝酿会的规模虽小,议程设置也较为简单,但却处处彰显着细腻的情感动员技艺。相当一部分农民是以紧张、抗拒的心情参加酝酿会的,甚至还存在拉人参会现象。为平缓群众心态,干部尽量营造一种放松的会议氛围,不仅让农民自由发言,还故意打乱会场布置,因为“摆桌子凳子,排场子,这场合的本身,就对群众是一种压迫”^[36]。为打开局面,充分调动群众情绪,干部已经在会前布置好让积极分子配合他们发言,“在宣传中为使上下呼应,接[结]合双方情感,在讲到群众之痛楚时,下面要先布置积极分子,激发群众的情感,使我宣传动员者的情绪与下层密切结合”^[37]。对于是否让地主参加酝酿会也是党必须考虑的问题。实践表明,由于农民对地主存在畏惧心理,刚开始便让地主参加,往往会吓得农民不敢说话,影响动员效果。在太岳区士敏县林村的酝酿会上,两个地主

像“两个‘老爷’坐在冬学里,像老虎一样,群众还是害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38]。为此,党多让农民先进行单独反省^[39]。然而毕竟让农民当面控诉地主并同其算账,又是提高农民胆量及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心理检验的重要方式。因此,党同时强调:“等群众初步觉悟,一定要和地主一齐去进行。”^[40]当农民的斗争热情被调动起来,又很容易因为主佃关系、压迫形式的不同,使与会者各执一词,导致会议陷于混乱状态。尤其是模糊斗争对象、扩大斗争面,造成斗争力量的分化。这也是导致此前减租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时候必须对农民的发言与情绪进行集中引导,具体做法主要是在算个人账、家庭账的基础上,带领农民开展全村的算大账运动。经过这一环节,农民得出了新的结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老根是地主。”^[41]农民对地主燃起愤怒之情后,党强调不可在酝酿阶段停留过长,而是要在情感尚未降温之际,立即转入减租斗争。

三、情感在斗争中升温

农民对地主的积怨被挖掘出来后,党迅速将减租运动引向斗争阶段。减租斗争开始时仍以开会的形式进行,也被称作“说理会”。同酝酿阶段不同的是,会议的重点已经从情感动员转向经济斗争。斗争会看上去是在说理且场面相对温和,但地主不会轻易放弃任何既得利益,说理的背后是农民与地主的反复博弈与激烈对抗。

尽管各地在酝酿阶段使农民萌生了同地主斗争的想法,但实践表明,让农民鼓起勇气面对面地向地主争取利益,并非易事。相当一部分斗争会刚开始,便因农民对地主的恐惧而被迫终止。个别干部已经将发言内容和顺序安排妥当,但会上地主“把眼一瞪,吓得一些佃雇把头藏进怀里,不敢发言,斗争会没有斗起来”^[42]。佃户在斗争会上表现怯懦,除了怕地主打击报复外,还同地主的强硬气势密切相关。地主根据往年经验,并不畏惧减租运动,他们在会上巧言善辩,甚至还公然恫吓

佃户,在场面上占据优势地位。在太岳区阳南县董封村的说理会上,地主“不但不答应代表的要求,反而大骂一顿”^[43]。由于地主在斗争会上占了上风,一部分本就对减租持观望态度的中农、富农、小商人等中间势力,更是迅速倒向地主一边。这使得干部们只能先暂时叫停斗争会。为打消农民依赖干部、不敢斗争地主等心理,干部们进行了更具针对性的会议准备和思想教育。如以地主为单位将佃户编为小组,进行调查,并对佃户进行启发教育,让其敢于说话,维护自身利益^[44];会前“指示对付地主的对策,估计地主可能的那一套,告诉他们应付的办法”^[45];也有部分地区采取了个别谈话、喝酒壮胆、寻求邻村支援及制造舆论等手段,壮大斗争声势。

农民在争得部分利益后,会产生更高的斗争热情,并促使他们鼓起更大的勇气。这使得地主对斗争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由轻视到重视,并实施抵制和反抗。以生病、有事为由拒绝参加斗争会,是地主消极抵抗斗争的惯用方式。见此情况,有的地区会组织农民用担架把装病的地主抬到会场,强制其开会^[46];也有的找几个佃户装作同地主聊天,“慢慢地斗争起来”^[47]。在会上谎称同农民没有租佃关系并否认存在账目,是地主消极抵抗斗争的又一常见手段。尽管地主藏匿了证据,但农民在酝酿阶段已有过算账经历,对地主的剥削事实有一定了解,便主动提出同地主当面算账。然而在算账过程中,由于地主拒不承认或散播“算账不掏良心”等谣言,使算账长期得不到结果,让农民失去了耐性。在太岳区宝庄,由于地主的顽抗,算账四天四夜仍没进展,致使“佃户债户们嚷起来,张世昌不拿出账就算不下去”^[48]。特别是佃户们想起过往地主故意拿无账推托,趁机到县里诬告的经历,更是引起了恐慌心理。干部们发现问题后,立即叫停斗争会,并重新召开农民大会,一方面安抚农民情绪,领导农民继续算账;另一方面则在会下,通过动员地主家属等方式说服

地主主动交出账本,并暗中派积极分子搜寻账目。

在通过消极抵抗拖延斗争的同时,地主还在暗地里以贿赂干部及对积极分子施以小恩小惠等方式分化农民力量。这对减租运动的破坏力更大。尽管相比于抗战初期,此时华北根据地已经开展过比较深入的政治改革,党员、贫农占基层干部的比重大为增加,但在部分地区以中农、富农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仍掌握着基层政权。“这些中间势力虽然也有民主和民生的要求,但他们对地主的斗争往往是脆弱的和不彻底的,一遇到顽固分子的抵抗和反攻,就‘很容易妥协’,甚至‘会出卖这一斗争’,导致民主民生斗争的夭折。”^[49]由地主阶级或其代理人把持农会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因此,在斗争会上常出现村干部或农会干部偏袒地主,压制斗争的现象^[50]。除此之外,地主以给与钱粮、攀亲戚及施展美人计等手段贿赂、拉拢干部的行为就更是多见^[51]。

尽管此前农民对地主与干部间的徇私舞弊行为,甚至是公开包庇行为也有所了解,但多是敢怒不敢言。然而当农民的怒火在减租运动中被不断点燃,加之农民在同其他干部的相处中感受到,多数干部是要坚决执行减租政策的,就逐渐克服了对贪腐干部的畏惧心理,甚至将斗争的矛头转向了阻挠运动的干部。在太行区七分区便出现了撤换干部的呼声^[52]。为响应群众号召,减少减租阻力,各地在斗争阶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必须把农村中最贫穷最革命的无产者、半无产者雇佣贫农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在斗争中凝结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树立起农村的领导核心,彻底改造村政权,才能从根本上打退不法地主的猖狂进攻,夺取民主民生斗争的决定性胜利。”^[53]但从实际行动看,各地在斗争阶段,为了团结力量将斗争矛头对准大地主,多没有大范围撤换基层干部,只是在斗争会上揭露干部存在的各类违法行为,令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群众对干部的宽容与谅解,仅仅“对历史不好、成份恶劣而又不

可救药的分子,才大胆由群众去撤换,但也应争取其在群众中反省转变”^[54]。还有的地区采取从村干部、农会、积极分子及农民中选取代表,成立减租委员会的形式,摆脱了受贿分子对减租运动的干扰。

除了上述情况,还有的地主在会后直接找到农民,通过允诺将积极分子的地转租给他,或降低其租息及偷予钱粮等方式,让农民带头放弃斗争。对于这类现象,党主要依靠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实行社会监督,并在斗争会上对落后农民进行批评教育等方式予以解决。经过反复较量,部分地主在斗争中败下阵来,当面同农民换签新约,并交出了非法剥削的粮食。在胜利面前,群众感受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只有在民主民生斗争几个战役打过之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才敢投入斗争^[55]。尽管多数地主特别是顽固地主仍未妥协,但群众已经认识到,由于他们的联合,胜利的天平已经在向他们倾斜。这将激励农民采取更为猛烈的方式与地主进行斗争。

四、群众大会阶段

经过说理斗争,少部分农民的权益得到了满足,但从整体上看,减租政策仍未得到彻底执行,尤其是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在当地拥有威望的大地主,多拒绝减租。由此,党领导减租运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群众大会阶段。这也是整个运动的高潮阶段。

从规模上看,群众大会的规模从百人到万人不等。在大会召开前,会场的布置、会议议程等进行了精心筹备。通常各地会将农民怨言最多、剥削农民最重的主作为首个斗争对象,同时也要求其他中小地主参会。这是快速扩大斗争范围、掀起斗争热潮的重要方法。个别地主在群众大会上仍然保持着冷静甚至是高傲的姿态,但绝大多数地主却感到紧张,以至于恐惧。地主的畏惧来自会场氛围。大会上,地主处在群体的对立面,威

严的群体让其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为了增加斗争力量,还专门召集多村或整个地区开展联合斗争。前来助阵的外村人,采取的斗争手段往往更为激烈,带头提出的要求也更为严苛。在会场里还有民兵守门,准进不准出。有人观察到:地主进入会场时,身体已经开始发抖^[56]。在大会上,部分地主也试图争辩,但多数情况下,农民不再给地主“说理”的机会。地主的话往往没有讲完,农民就愤懑不平地打断讲话。在大会上颇为团结的农民群体,并不是在大会召开前便已经形成的。开会前仍有部分农民因为惧怕地主而“不敢进去”^[57]。但只要他们听说或亲眼看到地主在会场上的狼狽形象,就会急切地参与到斗争之中。

在热烈的情绪感染下,人们在大会上的发言极其激烈,就连平日里不善言辞的农民也争先恐后地向地主发起控诉,甚至多位妇女曾在会场上一齐冲到地主面前,哭诉被其奸污过的难言之隐^[58]。他们控诉的内容不仅关乎自己,还包括为他人抱不平。“每一个问题,虽然不是自己的事情,却都发表意见。”^[59]与此同时,本来对减租政策持观望或反对态度的中农、富农、小商人,为了撇清同被斗争的地主的关系,担心自己也被斗争,也在大会上“跑到积极分子里头”^[60]。群众大会好比一个巨大的聚力器,所有个体的力量均指向了被斗争的地主,而愤怒的情感则是力量的粘合剂,再顽抗的地主,都难免被群体的力量所吞没直至崩溃。

首先举行群众大会的村庄,也被称作重点村或基点村。寄希望于在一村实现重大斗争胜利后,立即将经验传递到周围地区,形成区域性减租运动。因此,各地多高度重视首场群众大会,不仅会集中各村骨干力量共同筹备,还会主动召集邻村群众前来助阵。而一场群众大会的终点,往往是更多群众大会的起点。这既是主动宣传动员的作用,也是情感传染的结果,“权威的原则一旦在公众心目中开始受到损害,就会迅速瓦解”^[61]。到邻村参加群众大会的农民,回到村里立即商量如

何斗争本村的顽固地主。这时未被斗争或感觉到即将被斗争的地主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开大会”已成了他们最惧怕的事情之一,并主动提出不要开大会。然而他们的哀求是无效的,群众大会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地主见势想要躲避起来,甚至谋划着逃到敌区。干部及农民察觉后,有的派民兵暗中监视地主,还有的则直接将地主绑到斗争大会现场。

群众在大会上的表现愈发强势,接连出现了过激行为。这引起了华北根据地,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的注意。1945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到冀鲁豫分局巡视工作时,便在肯定减租成绩的基础上,批评了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62]。在此指示下,各地迅速开展了纠偏工作。事实上,在整个减租运动中,这一环节是群众情感最难把握的阶段。当时在一线领导减租运动的太行区平顺县委书记王宗淇便直言:“这时是领导上最难掌握的时候。”^[63]无论是打压,还是放纵群众的过激行为,均不利于贯彻减租政策。相对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当地主普遍认可减租政策后,将群众在宣泄情感时的激烈行为转换成非破坏性行为。这样便可以既保持群众的减租热情,又使运动得到控制。

干部们发现,只要地主在执行减租政策的基础上,主动向农民示弱,是能够获得后者谅解并克制过火斗争的。太行区就通过“召开追悼会,举行公祭,让那些地主、恶霸参加,有的还给立碑、甚至披麻戴孝”等活动,“使群众在政治上完全占了上风,然后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就会比较冷静,也会对地主有适当让步”^[64]。除了肃穆的祭奠活动,召开胜利大会是宣泄群众情绪的又一重要方式。为庆祝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坚定群众团结起来的信念,党会领导群众将地主归还的钱粮集中带到胜利大会现场,随后举行有群众参与的文艺活动,以载歌载舞的形式表达心中的喜悦之情。最后则引导群众对减租运动进行反思与总结,民主

议定“防止地主反攻”的办法。在个别地区,尽管干部明知,农民在情绪高涨时提出的农会每5天开一次会,多次不到便要实行开除、没收粮食等惩罚措施,“实际上是不适用于平时的”^[65],但还是让群众以公开议论的方式,发泄内心情感。在运动总结大会上,先让各村报告各自情况,再由群众评议运动中的优点与失误。经过热烈的讨论和检讨,运动中存在的过激行为得到了自觉纠正。

五、斗争延伸与新情感的确立

一直到群众大会阶段,减租运动主要围绕经济斗争展开,当群众的经济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有必要将工作引向政治斗争。一方面这是纠正群众过激行为的有效办法。当地主在经济上作出重大让步后,倘若不将斗争矛头从经济转向政治,就很容易导致运动失控。如晋西北根据地河曲县减租委员会在检讨斗争经过时首先提到:“没有将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对斗争估计不足。”^[66]另一方面,开展政治斗争是巩固减租成果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在整个减租斗争中,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是互为目的与手段的依托关系。然而,倘若从抗战大局出发,特别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视角下审视减租运动,它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只是它的表现形式。由于党在土地政策上,坚持不没收地主土地,便注定了地主在经济上仍将占据优势。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党要想实行减租政策,给农民实惠,以达到动员农民、得到农民支持的目的,必须建立巩固的政权,在政治上获得优势。担任冀鲁豫边区民运部长的信锡华就曾在1943年明确指出,“地主的力量是经济力量,我们的力量是组织力量、政治力量与法律。今天我们就是要以群众的进步力量来对付他的经济力量”^[67]。这一点在地主的表现上也能得到印证。干部们在总结减租运动时发现:“当群众进行民生斗争时,顽固势力往往在经济上采取某种程度的让步,在政治上仍设法维持其统治,但到群众进行民主斗争时,顽固势力则拼死挣扎,千方

百计的来顽抗,形成斗争最尖锐形势。”^[68]由于地主的阻挠,华北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改革长期存在不彻底问题,这又导致减租减息等民生改革成果难以得到巩固。而减租运动则为党一体化推进民主民生改革提供了契机。

为了从政治上巩固斗争成果,各地在实践中具体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改立新约。减租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减少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从过往经验看,地主表面上答应减租,事后或背地里反悔甚至报复农民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此时农民一方也出现了不愿交租的声音^[69]。因此从长远看,斗争中形成的情感认同并不牢靠,还必须上升到刚性约束。于是,各地于斗争大会后,普遍开展了立约工作。有地区明确将立约作为减租斗争的最后一步^[70]。此外,让农民参与其中是改立新约工作的一大特点,“经过全体佃雇讨论集中起来,成为正确的,制定成法令”^[71]。

二是改建基层民主政权。如前文所述,早在酝酿及开斗争会阶段,各地已经撤换了部分偏袒地主或被腐化的基层干部,只不过当时为了稳固政权,将斗争矛头对准地主,干部改选严格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而将政治改革的重点放在批评教育干部以改进干部的整体工作作风上。以太行区平顺县为例,“全体干部的80%是得到改造的”^[72]。而待整个减租运动接近尾声,各地立即调整了政治改革的重点,即从批评教育干部转向民主选举干部。而民主选举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让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农民领袖担任基层领导职务。如太岳区阳南县明确提出,“提拔农民做政权工作,村政权要多吸收农民积极分子参加,村政委员会农民应占多数”^[73]。而经过思想教育和激烈斗争,多数农民已经认识到他们同地主的阶级差别,并在政治上排斥地主。如各地斗争中普遍出现了人们申请加入农会的热潮,但农民却拒绝了地主^[74]。在选举村干部时,农民更是愿意将票投给积极分子,这使得“大部分农民领袖被选为村

长”^[75]。

在通过政治改革巩固减租成果后,党立即领导农民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第一个革命(减租减息)基本上结束之后,必须迅速转入第二个革命(大生产运动)”^[76]。大生产运动除了强调发展经济外,更注重以“组织起来”的形式进行农业生产。而农民刚好在减租运动中认识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这将有利于农民在生产中建立互助组织,同时互助组织的普遍建立,也能够进一步增强农民的团结意识,以巩固减租成果。随着减租运动接近尾声,农民情感在形式上又复归于平静,但实质却发生了转变。一方面是地主声威削弱。减租后佃农的政治地位明显提高,如过去佃户在地主面前是不敢讲道理的,现在他们“都敢于说话了,敢于和地主斗争了,这与过去封建残余统治下的农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77]。另一方面则是党的威信建立。群众在情感上更加信任与感激共产党、八路军。这突出表现在减租运动后,华北各根据地普遍掀起了拥军参军和积极生产的热潮。

结语

综上,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斗争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实践过程,而造成减租政策难以贯彻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华北根据地创建不久,又频繁遭受日军侵扰,以党掌握的武力、财力资源,很难在华北地区树立强大政治威信特别是得到基层民众的认同,这导致减租政策难以落实。二是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减租被视为一项温和政策,然而实践中,地主在居于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不愿让渡利益,并以收回佃农赖以生的土地相要挟或报复。在当事人看来,减租运动同“部队的战斗一样严肃,同样是生死的斗争”^[78]。上述原因决定了,农民以个体形式按法规要求地主减租很难取得成效,甚至绝大多数农民根本不敢提出这一要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农民唯有结成群体,才能获得同地主较量的资

本。“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79],而情感动员恰是党将农民组织起来的主要手段之一。这条党在实践中得来的可靠经验,被广泛运用于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中。纵观情感动员的整个过程,党细腻的动员技艺在调查研究、开斗争会、算账诉苦等环节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这又是以党在组织、宣传及政治建设等方面的优势为支撑的。总而言之,解释中国共产党获得群众认同的因由,不仅要考察政策制定、组织建设等常规举措,还应充分关注情感动员等常常被忽视的独特工作方法,进而呈现出党领导群众运动的全景。

注释:

①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李金铮:《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张玮:《中共减息政策实施的困境与对策——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借贷关系为例》,载《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徐建国:《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与中共保障佃权问题研究》,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3期等。

②本文中的情感动员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调动与引导群众情感,使减租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的一种工作方式。

参考文献:

[1]参见徐建国.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模式分析[J].中共党史研究,2011,(6);俞小和.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中的“说理会”[J].中共党史研究,2016,(2);王龙飞.减租减息的演进——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2]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G].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39-40.

[3][4][5][6]河北省档案馆.河北减租减息档案史料选编[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3,3,70-71,119.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1.

[8][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韩惊,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51.

[9][18][21][28][31][34][35][39][40][41][52][54][63][64][69][72][76]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七卷[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477,469,416,451,476,523,523,455,455,528,419,429,528,482,443,487,487.

[10]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153.

[11][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4,296.

[13]王龙飞.减租减息的演进——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14]刘少奇选集:上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37.

[15][24]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140,207.

[16]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288.

[17][26][78]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的减租减息[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61,62,212,230.

[19]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忆沂蒙——临沂地区党史资料:第二期[G].内部刊物,1983:69.

[2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7-101.

[22]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102.

[2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1.

[25][44][46][47][56][57][66]理红,理京.高鲁日记[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469,475,501,468,432,439,441.

[27][32][37][67][68]谢忠厚.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册[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409,508,410,448,385-386.

[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18.

[30][36][42][49][53][58][60][65][70][71]谢忠厚.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下册[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523-524,527,927,922,922,927,547,537,534,539.

[33]谢忠厚,李运亨.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第一辑

[G]. 内部刊物, 1986: 75.

[38]王毅, 李杰. 踢翻廿年来压迫者 林村群众搬倒“老爷” 李得士李长法在群众面前认错退出贪污社粮[N]. 新华日报(太岳版), 1945-03-17.

[43]丁野. 董封村千二百人开大会 斗争不法地主燕成龙 第一天解决问题六十多件 还有八十多件继续辩论中[N]. 新华日报(太岳版), 1945-03-17.

[45]谢忠厚, 等.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 增订本[G].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13.

[48]宝庄减租斗争扩大 庙东等村佃户参加 经五天五夜追出账簿清算 张世昌应退租百七十余石[N]. 新华日报(太岳版), 1945-03-13.

[50]李香亭. 南园佃户讨论抓破情面 给地主依法说理[N]. 新华日报(太行版), 1945-02-03.

[51][55]谢忠厚, 李亨亭.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 第五辑[G]. 内部刊物, 1986: 90, 93.

[59]九思. 淇县黄洞减租斗争[N]. 新华日报(太行版),

1945-02-01.

[61][法]勒庞. 革命心理学[M]. 佟德志, 等译. 太原: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0: 186.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 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551.

[73]刘裕民. 政权对群众运动扶植问题[N]. 新华日报(太岳版), 1945-04-19.

[74]太行区党委办公室. 林县张家庄的农会是怎样建立与壮大起来的? [N]. 新华日报(太行版), 1945-01-01.

[75]丁野. 四十天减租运动中 两万余人参加斗争 共减租四百七十石 退地一千五百余亩[N]. 新华日报(太岳版), 1945-03-07.

[77]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 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 山东党史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G]. 内部刊物, 1989: 54-55.

[79]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173.

Emotional Mobilization and Rent Reduction Campaign in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of North China

Shi Zeyuan

Abstract: Emotional mob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carry out mass work. During the Gener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having been unable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rent reduction policy by administrative means for a long time, began to completely switch to the rent reduction method by mobilizing the masses at the end of 1943. In this proc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asants' consciousness of rent reduction and dispel their fear of landlords, the base area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guiding the masses' emo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easants gradually gathered into a united group from scattered individuals, and won the vic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rent reduction with collective strength. At the same time, farmers also deepened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Emotional mobilization; The struggle to reduce rent; The North China anti-Japanese base area; Mass work